

冯天瑜
主编

转 型 间 学 人 评 传 书 系

纯 粹 的 学 者

王国维

鲁西奇 陈勤奋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转 型 间 学 人 评 传 书 系

冯天瑜 主编

纯粹的学者

王国维

鲁西奇 陈勤奋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纯粹的学者——王国维/鲁西奇, 陈勤奋著.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转型间学人评传书系/冯天瑜主编)

ISBN 7-5351-2434-8

I. 纯… I. ①鲁… ②陈… III. 王国维 (1877~
1927) - 哲学思想 - 研究 N. B259.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6064 号

出版: 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行:

汉口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 430022 电话: 85443735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 (430015 · 汉口新华下路 192 号)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5 插页 10.75 印张

版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58 千字 印数: 1—3 000

ISBN 7-5351-2434-8/K · 68

定价: 19.6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 承印厂为你调换

总 序

冯天瑜

历史的演进,多数时段是在同一社会型范内部运行的,但当各种内外条件细缛积淀,达到某种临界点时,整个社会固有的动力定型便发生突破性变更,正如液态水加温到摄氏 100 度时即转化为气态水一样。纵观人类历史,曾发生过几次大的社会转型,如从蒙昧时代向野蛮时代转型(核心内容是采集—渔猎经济向农业—畜牧经济变换),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型(标志是金属工具和文字的使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随着人类自觉意识的提升和改造外在世界能力的增强,社会变迁赢得了加速度。如果说,前述两次转型的完成,历时数以千年计,那么,在文明时代,某些社会转型往往经数百年便大体完成。以中国历史而论,周秦之际的两三百年间,曾发生从领主制社会向地主制社会的变迁,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体制乃至观念形态均有大更革,清初哲人王夫之将战国时期称之“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读通鉴论》),是颇富历史感的概括;此后发生的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更革、唐宋之际的社会更革、明清之际的社会更革,均在百十年间实现。与这些社会更革相互推引,其间学人们展开了风姿卓异的精神创造活动,构成中华文化史上璀璨夺目的篇章。

若就社会变迁的深刻程度而言,可与前述蒙昧时代走向野蛮

时代,野蛮时代走向文明时代这两次大的社会转型相类比的,则是发生在近几个世纪的现代转型。在长达数千年的文明时代的前期和中期发生的种种社会异动,大体都是在农业—宗法社会内部的局部变迁,而近几个世纪渐次扩及整个世界的现代转型,则是一种全局性的社会质变,其变化的广阔度和深刻度,均不可同日而语。

二

近几个世纪发生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现代转型,基础性内涵是自然经济占主导的农业社会向商品经济占主导的工业社会转化,其显著标志是,有机动力系统(人力、畜力)为无机动力系统(矿物燃料、水力、核能)所接替,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作,人类获得财富的手段由驯化利用天然原料为主,变为加工改造天然原料为主,“顺应自然”演为“征服自然”,“高效率”和“标准化”成为经济生活的准则。与物质文化层面的巨变相表里,在制度文化层面,彼此隔绝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静态乡村式社会,转化为日益开放的、被种种资讯手段紧密联系起来的动态城市式社会,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变为异质的多样性社会,礼俗社会变为法理社会,人际关系的枢纽由身份演为契约,宗法—专制政体为民主—法制政体所取代。作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转型的精神先导和思想反映的观念文化,也在这一过程发生深刻的变异,诸如神本转向人本,信仰转向理性,宗教转向科学,教育从少数特权阶层的专利变为大众共享。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转型过程所必须完成的社会重建和文化重建任务,则分别由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壮大,知识分子的形成与壮大而逐步得以实现。

上述是就现代转型的世界通义而言的。这种现代化的通约性,在物质文化层面表现明显,而在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层面,通约性固然无庸忽略,但民族特殊性也各展丰姿。

三

以世界之大,各地区、各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颇不平衡。就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而论,是以 14—16 世纪南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和世界性远航开其端绪的,此间勃生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为其文化标志,学人代表则有但丁、达·芬奇、莎士比亚等文化巨匠;这一转型的富于力度的展开,则是 18 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继起的法国政治大革命,其文化标志为启蒙运动,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伏尔泰、洛克、哥德是启蒙时代的学人翘楚。成长于西欧的工业文明伴随殖民扩张又延至北美,进而波及全球。世界历史以统一市场的形成为契机,从分散走向整体,五洲四海的人类无论自愿还是被动,均渐次汇入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大潮之中。

对于西欧而言,发端于 14 世纪,正式展开于 18—19 世纪的现代转型是从中世纪的母胎内自然孕育而成的,可以称之“内发自主型”。对于西欧以外所有其他地区而言,现代化过程虽然各有不同程度的内在动因,却都是在世界历史已经走向整体化之际逐步实现的,也即在西欧现代文明强有力的影响与示范之下得以发生,因而其现代化可以称之“外发次生型”。

西欧以外地区的“外发次生型”现代转型,又大略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别。一种是欧洲殖民者入侵之际,土著文化十分落后,如北美洲和澳洲,欧洲人前来殖民时,当地人尚处在新石器时代,欧洲近代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连同人口,全盘迁徙而来,因此,北美洲(美国和加拿大)、澳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现代文化是西欧模式的整体移植,也可以说是“全盘欧化”,那里出现“新英格兰”、“新威尔士”、“新奥尔良”等地名,正是欧洲文明整体移植的表征。另一种类别是,当地早已形成悠久深厚的文明传统,如埃及、波斯、印度、中国、日本,都有数以千年计的文明史,欧洲近代文明来袭之际,这些国度虽然尚滞留在“前近代”,却不同程度地拥有

与外来的欧洲文明相抗衡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因而,这些国度的现代化,并非欧洲文明的简单位移,而呈现欧洲文明的强劲影响与本土文明对此既排拒又吸纳所构成的错综图景。这类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并非“全盘欧化”,而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化合反应,就当地人而言,既要完成文化的时代性转换,也要实现文化的民族性因革。这两者间虽包藏着统一的内蕴,却往往在相当长时段呈现相互矛盾、彼此抵牾的外观。而作为这些地区文化重建任务担当者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即本丛书所称的“学人”)特别敏锐、深切地感受着并且反映着这种矛盾性。

四

近代中国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都是19世纪中叶以降“古今中西”文化交会的产物。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19世纪末叶方开始出现,20世纪则艰难曲折地成长。由于内外条件的制约,中国的中产阶级底蕴不足,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经济上、政治上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宗法—专制势力的依附屈从,而且,因为中国历来缺乏市民政治独立、文化自主的传统,故而中国中产阶级在精神上患有先天软骨病,既无力量,也无胆略充分担当起社会重建使命,于是,这一日渐紧迫的任务连同文化重建任务,一并落到同样发育并不充分的知识分子肩上。而中国知识分子则义不容辞地一身二任焉,这除了客观条件所使然(如中产阶级未能充分担负分内责任)之外,更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渊源与特色大有干系。

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是春秋战国以来延绵两千余年的士大夫。作为现代社会和新的世界背景的产物,身着西服(或中山装或毛式服装)的知识分子在时代意识、知识结构、角色认同等方面均与长衫博带的士大夫颇相径庭,特别是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基本摆脱了君统与道统的双重负担,不再以“忠君事亲”、“代圣贤立言”为行事作文基准,其生活路径也大体走出了“学

优登仕”的故辙。然而，中国知识分子虽脱下士大夫的长袍，但在精神上却承袭着士大夫的某些传统特质。以本丛书涉及到的诸学人为例，大多有直接的士子经历，且不论魏源、冯桂芬辈均有功名，并曾入大吏幕府，或一度执掌州县，蔡元培是前清翰林，梁启超是前清举人并出入宫廷及大吏门墙，即如鲁迅、陈独秀，也都有“三味书屋”式的传统教育背景。他们大体都是从士大夫走向知识分子的过渡形态，在某种程度上保有传统士子心态是情理之中事。

秦汉以降，中国的社会阶层序列是“士农工商”，与商人自陪末座相对应，士人历来居四民之首，不仅自视国家栋梁，也被社会认作人中精英。“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孟子·告子下》），便是士子豪迈情怀的写照。在认知层面，士人以“求道”、“闻道”、“弘道”为旨趣，以先觉觉后觉、先知觉后知为使命；在政治层面，士人以“平治天下”为目标，但这一目标往往要在依附君权的情形下才能得以实现，由此造成士人“忠君”、“事君”特性；士子又秉承先秦以降的“民本”传统，有着“亲民”、“为民”倾向，故常在“尊君”与“重民”间徘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岳阳楼记》）是他们二重心态的流露。汉代的选举制，尤其是隋唐以下的科举制将士人的治世追求变为活生生的制度性现实，也将士人与君权维系在一起。总之，无论是士人的自命，还是社会的期盼，士人都扮演着“精神导师”与“官僚后备队”的双重角色。19世纪中后叶以降，中国传统社会格局崩解和重组，但从士大夫转变而成的知识分子虽有日益“边缘化”的趋向，多已走出“忠君”、“事君”故辙，却并未忘却“平治天下”的使命和充当大众精神导师的任务，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将西方知识分子和西方中产阶级分别担当的社会重建和文化重建任务一肩挑起的历史因由。李大钊的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正将中国现代学人的双重使命感精要地表述出来。

五

中国近现代社会处于古今更替、中西交会的大转折时期,具有过渡性时代的全部复杂性。这种过渡时代向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提出的使命,不仅有文化的古今转换,还得面对文化上的民族性传承问题。而中国近现代学人大都在少年时代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多有深厚的家学渊源,青年时代又沐浴欧风美雨,不少人曾留学东西洋,其知识结构兼有“子曰诗云”的中学和涉及声光化电、艺文哲思的西学,成为时代性上的“古今过渡人”和民族性上的“中西边缘人”,其认知系统、行为系统和情感系统呈现多重性,其社会实践(包括学术实践)更异彩纷呈。转型间的中国学人,有的坚守民族文化本位,却又汲取了西学的某些成分(如梁漱溟、熊十力);有的呼唤“全盘西化”或“全盘世界化”,却实则植根本土文化(如胡适);有的早年力倡西学,晚年又回归东方文化(如严复、梁启超)。而这批转型间的学人都有深刻的传统文化情结,即使那些激烈倾向西化的学人,实则理智向着西方,情感却执著于东方。这些都是过渡时代文化二重性的表现。

自19世纪中后叶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迭兴之际,到20世纪上半叶的数次文化论战,中西体用问题一直是热门话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常用语,而批评此说的论者也言之滔滔,自成理路。这正是国人为求得文化二重性矛盾解决方案所作的努力。时至20世纪末叶,改革开放大潮涌动,文化讨论再度兴起,中西体用之辨仍然是一大题目,在“中体西用”说之外更出现“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诸说。有人认为这种旧题重说表现了文化讨论的缺乏新意,我却以为这一回环现象正显示着文化二重性矛盾继续困扰着当下国人,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对此无可规避。仅仅在这一意义上,反顾并总结本丛书诸传主的心路历程和思维教训,也是大有益处的。

六

转型间中国现代学人各有专业领域,其中一些人在其学术天地足以同古哲媲美,与国际同行并驾齐驱,堪称富于创识的文化大师级人物,他们在文化重建方面的贡献,令人景仰。本丛书传主中王国维之于史学与文学、鲁迅之于文学、胡适之于学术多种门类的建树,均可谓丰碑。与此同时,中国现代学人作为士大夫传人和现时代的精神导师,又身怀“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抱道忤时”的忧患意识,不少人还保有“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与政治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性。有些人(如王国维)虽远离政治,却以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托命者自况,怀抱高远,绝无降格为技艺之士的意向。由于这些品格的作用力,加之客观环境的挤兑,如内忧外患的中国竟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以致相当比例的中国学人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不是走进书斋、实验室潜心于文化建设,而是以文化人和社会良知体现者的双重角色,投身民族救亡、社会变革、大众启蒙。低吟“布衣老大伤怀抱,忧国无端有叹声”(《梁星海编修免官寄赠》)的康有为,虽也有构筑庞大思想体系的努力,但有欠精当,他的闪光处却在鼓动变法,导演“百日维新”的悲壮剧;康氏弟子谭嗣同则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雄精神”,献身菜市口,演出戊戌变法最惨烈的一幕,人们纪念于此,显然远过于对谭氏颇有拼凑感的《仁学》一书的关注。至于以“革命军中马前卒”自命的邹容、蹈海自尽以警醒国人的陈天华,所著之《革命军》、《狮子吼》、《猛回头》、《警世钟》等,其革命鼓动功能大大超迈其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蔡元培的美学论著虽不乏会通中西的努力,但毕竟有欠深刻周详,他的伟绩乃在以民主精神、“兼容并包”气度创办中国新文化的摇篮——北京大学。新文学的代表作家鲁迅,青年时代即立志“我以我血荐轩辕”,他的白话小说文学价值不朽,但他创作此类篇章意在“为社会”、“为人生”,而并无意挤进“纯文学”的殿堂。

总之,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本丛书传主多处在此阶段),中国学人虽然也致力于文化重建,在这方面功不可没,我们今日从事的文化工作必须以他们的先期努力为基础,但本丛书传主们作为那一时代最活跃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往往直接投身于如火如荼的社会变革之中,成为活动家及领袖人物,或者响应革命前驱的“将令”,使自己从事的文化工作隶属社会改革,成为其工具与武器。纯粹学科意义上的文化重建,当时常被视作不急之务,少数潜心于学科建设的文化匠师(如王国维、陈寅恪、熊十力)长期被社会所冷待,然而,他们的默默耕耘,实乃转型间文化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时间的推进,其价值日渐彰显。本丛书兼收这两类学人,其意在全面反映转型间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风貌,并显现其各自的价值。

七

本丛书的各位执笔均是中青年人文学者,对传主有相当研究,而作为新一轮古今中西文化交会的亲历者,他们对转型时代自有了新的体验,这正是对前辈学人心路历程能够得以理解并进行诠释的现实基础。

本丛书的总体设计是否略有创意,各篇的具体展开是否精当,在众多的近世学人传记中,本丛书是否有特别的存在意义?对于这些,实在没有把握,尚待读者诸君阅后评判。

1998年4月上旬构思于武汉大学
4月下旬成文于日本爱知大学名古屋校舍

目 录

总序/冯天瑜	1
一 委蜕大难求净土	1
1. 昆明湖自沉	1
2. 死因诸说及分析	2
3. 最是文人不自由	28
4. 平生多恨自缠绵	43
5. 死生事大	49
二 伤心最是近高楼	51
1. 从康德到叔本华	51
2. 《论性》、《释理》与《原命》	59
3. 《红楼梦评论》的哲学意蕴	68
4. 古雅、游戏、天才	77
5. 非功利的教育观	88
6. 静安哲学思想之重新检讨	99
三 此情不关风与月	104
1. 入洛才华正妙年	104
2. 静安诗词略论	118
3. 剖别派流施品藻	138
4. 宋元戏曲有阳秋	150
四 欲向故纸觅真知	166
1. 静安国学研究之总概	166

2. 文字学的革命者	179
3. 关于古器物的研究	205
4. 古史新证	218
5. 流沙探幽	226
6. 大漠访古	240
7. 史学方法论	250
五 吾侪所学关天意	262
1. 学者的使命	262
2. 斯文自有千秋业	268
3. 现代与传统	293
4. 天下谁人还识君	310
附录一 王国维著述目录	318
附录二 主要研究文献	324
后记	328

一 委蜕大难求净土

1. 昆明湖自沉

1927年6月2日,旧历五月初三,清华学校教授、国学研究院导师、51岁的王国维(静安)先生与往常一样,于上午8点准时到达研究院办公处。坐下后,即命院中听差到他的私第去取本学期学生的成绩记录,并与研究院工作人员侯厚培一起谈论了许久下学期的招生事宜。约9时许,王国维忽然提出要向侯厚培借2块银元,因侯身无现洋,即借给他一张5元的钞票。静安先生随即步行至校门口,雇了一辆人力车,直赴颐和园。约10时左右进园,先在昆明湖畔石舫前兀坐良久,复步入鱼藻轩,吸纸烟数支,旋由此处之石阶跃入水中。时距离鱼藻轩约四五丈处有一清道夫,见有人投水,即刻跳入水中,将他救上湖岸。王国维虽入水仅约两分钟,但已气绝。盖先生年老,湖水虽浅,底皆淤泥,入水时必头先触底,以致口鼻俱为泥土所塞,因之气窒。时园中诸人未知其为何人,只得将先生遗体暂置鱼藻轩中。迨人力车夫在园外候至下午3时,仍不见先生出园,询之园中人,始知投水者为先生。适此时先生的三公子贞明在家久候父亲不归,追踪至园,乃认知为其父。侯厚培旋亦闻讯赶到。至下午7时顷,消息乃传遍清华。学校当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当晚9时许,校长曹云祥、教务长梅贻琦及清华教职员与研究院学生20余人乘汽车到颐和园。时园门已闭,

未能全体进园,进去者只校长、教务长及警卫数人。翌日晨,教职员及学生、王氏家属多人均来。时先生之遗体,仍置于鱼藻轩中地上,覆以一破污的芦席。学生见之多流泪,有失声痛哭者。直候至下午4时,京师检察厅的检察官才来验尸。于王之内衣口袋中,搜出现洋4元,以及给三子贞明的遗嘱一封,其文云: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殓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验尸毕,家属及弟子们即舁尸至颐和园西北角园门外三间空屋中,正式入殓。一代通人,遂与世人永诀。^①

2. 死因诸说及分析

静安先生自沉后,各方议论纷然,莫衷一是。探求其致死原因,七十年来,悠悠之口,未尝或已,而主要有如下诸说:

(一)南军声势说

此说在当时就颇为流行。梁启超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

^① 关于王静安先生自沉之经过,1927年10月出版的清华述学社《国学月报》第2卷第8、9、10期合订本载有署名柏生(即刘节)所撰之《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对静安自沉前后之事迹有详细记载。此外,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出版的《文学周报》第5卷第1~4期合订本载有陈乃乾所撰《关于王静安先生逝世的史料》;日本昭和二年京都帝大文学部出版的《艺文》杂志第18年第8号载有金梁所撰《王忠愍公殉节记》等文均有记叙。以上诸文,一并收入台湾大通书局1976年出版的《王国维先生全集》附录中,见该书第5593~5610页、第5379~5381页。

15日致其长女令娴信中说：

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时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羞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①

当时报纸，如1927年6月4日天津《大公报》报道静安之死，亦云：

本月一日，王尚与梁任公会晤，彼此谈及目下时局，均谓难抱乐观。梁告以即将避地出京。王尤戚戚，未尝去怀。因王平日对国事即抱悲观，恐党军北上，视为叶德辉第二。而京中谣言，又谓党军不久将至。王因于二日……投水。

静安高弟刘节（子植）《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云：

今岁四五月间，党军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京大恐。是时清华研究院评鹭成绩方毕。五月二日午，同学公宴诸导师，为临别之会。座中先生为吾侪言蒙古杂事甚畅。其雍容淡雅之态，感人甚深。私念先生年未及衰，治学之意兴甚豪，自后受教之日长，今虽小别，同学或有感时叹息，戚戚焉，若大患之将临者，而某初未尝有寥落失意之思也。是晚，某与同学谢国楨谒先生于校西院十八号私第，问阴阳五行说之起源，并论日人某研究干支之得失。言下涉及时局，先生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焉。……先生之死，自有宿因；而世乱日迫，实有以促其自杀之念。方五月二日，某承教在侧时，先生云：“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呜呼，先生

^① 见《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5页。

致死之速，不能谓时局无关也。^①

又姚名达《哀余断忆》之四云：

六月一日正午为会，餐前聚坐，谈笑不拘形迹。有与众谈蒙古史料者，则静安先生是也。布席凡四，欢声沸腾。惟先生之席，寂然无声。不知先生之有所感而不乐欤，抑是席同学适皆不善辞令欤？然众方畅谈别情，不遑顾也。肴设将罄，任公先生忽起立致词，历述同学成绩之优越，而谓“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众皆谛听，静安先生亦点头不语。既散席，众与作别如平时，无异态。呜呼，孰知先生以此时死别诸生，而斯会竟若促先生之死也！别后有顷，名达与同学朱广福、冯国瑞同游朗润园。归途过西院。朱君忽问：“王师家何在？吾竟未一窥其状。”余谓：“盍往访乎？”既至，书室阒然无人。呼侍者电问南院：“在陈先生家否？”则曰：“在，即至矣！”俟之，果至。恳恳切切，博问而精答，相语竟一小时。晚餐已列，起身告辞。先生犹送至庭中，亦向例也。^②

这都是最直接之记载。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亦云：

先是，长沙叶德辉、武昌王葆心均以宿学为暴徒枪杀于湘鄂。及奉军战败于河南，北京震恐，以为革命军旦夕即至。其平昔与党人政见不合者，皆相率引避。先生本为一精深谨严之学者，而晚年笃守儒家经义，尚自编发，自矢为清室遗民，至是亦恐不能见容于党人，又深鉴于叶、王等之被执见辱，遂于民国十六年六月二日愤而自沉云。^③

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一文亦举叶德辉被枪毙之事云：

① 载清华述学社《国学月报》第2卷第8、9、10号合刊（王静安先生专号），署名“柏生”（据戴家祥先生谓，柏生，即刘节。见卞慧新：《重读〈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载《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44页）。

② 见《国学月报》第2卷8、9、10号合刊。

③ 载《东方杂志》第24卷13号。